

按下，还是不按

从正义的角度，重审 1945 年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

J

费曼式写法 ·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

导读

从正义的角度，重审 1945 年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

先别急着回答

「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，是正义的还是错误的？如果重新做一次决定，我该按下那个按钮吗？」

几乎每个人听到这个问题，三秒内就有答案。有人说「当然该，它结束了战争」；有人说「当然不该，那是屠杀平民」。这本书想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请你把那个三秒的答案先放一放——不是因为它一定错，而是因为**三秒的答案几乎从来不是你想出来的，是别人替你准备好的。**

这本书的方法很笨，分四步：

1. **先把现场还原。**1945 年 8 月的桌上没有一只「扔/不扔」的按钮，只有一列已经开动的火车：冲绳的尸体、东京的火、「默杀」的误译、二十亿美元的项目惯性。不看清这些，所有道德判断都是空对空。
2. **再把尺子备齐。**「正义」不是一个词，是至少三种算法：边沁和密尔的算盘（看后果）、康德的底线（看行为本身）、从奥古斯丁到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（看战争自己的规矩）。同一个决定过一把尺、栽在另一把上，是常态。
3. **然后让两边真打。**为扔弹辩护的最强论证（不是「救了一百万美国人」那个吹大的版本，而是「救了几十万亚洲人」那个诚实的版本），和反对扔弹的最强论证（「平民之死是手段而非副作用」），都会得到充分的陈述。中间的章节还要翻一张被严重低估的牌：当时桌上其实有五条别的路。
4. **最后回到按钮。**第十章不回避：我会给出我自己的回答——在 1945 年 8 月的信息下怎么做，在今天的信息下怎么做，以及为什么这两个答案不一样。

读完这本书，你的答案可能没变。但那个答案会从「别人给的」变成「自己挣的」——你会知道自己在用哪把尺、这把尺量不到什么、以及反对你的人在用哪把尺。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这就是能挣到的最好的东西。

顺便说一句：这本书讨论的每一个论证，今天都还活着。每一代决策者都会遇到自己的「按钮时刻」——只是按钮换了形状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一个八十年前的决定，值得你现在认真想一遍。

第一章 · 那个按钮之前

一个想象的按钮，和一张真实的办公桌

这本书的种子问题是这样的：**如果重新做一次决定，我应该按下投放原子弹的按钮吗？**

但在回答之前，我们得先拆掉这个问法里的一个假象：1945 年的夏天，并没有那么一只按钮。没有谁在某天早上走进一个房间，面对「扔」和「不扔」两个开关，深吸一口气，做出选择。真实的历史是一连串默认、惯性、备忘录和签字——危险恰恰在这里：当决定是滑出来的而不是拍出来的，「正义与否」的问题反而更容易被绕过去。

所以这一章先把 1945 年 8 月之前的世界摆回桌上。只有把当时人真正面对的东西看清楚，后面每一章的哲学辩论才有落脚的地方。

1945 年的夏天，美国人在看什么

几个必须记住的画面：

- **冲绳。**1945 年 4 月到 6 月，美军在离日本本土五百多公里的冲绳岛打了太平洋战争最惨的一仗。日军约 11 万人战死，几乎打到最后一兵一卒；美军阵亡约 1.2 万；夹在中间的冲绳平民死了约 10 万——其中相当多是被日军裹挟、甚至逼迫「集体自决」的。华盛顿从冲绳读出的是一句话：**日本人不会投降。**
- **东京。**1945 年 3 月 9 日深夜到 10 日凌晨，三百多架 B-29 轰炸机向东京投下燃烧弹，一夜之间烧死约 10 万人，比后来广岛原子弹的当场死亡人数还多。到 1945 年夏天，日本 60 多座城市已经被常规轰炸烧过一遍。换句话说：**原子弹不是「开始烧城市」，而是「用一架飞机做三百架飞机的事」。**这个先后顺序，是后面所有道德计算的前提。
- **「一亿总玉碎」。**日本军部公开的口号是全民战死，本土决战的「决号作战」已经在准备：征召 15 岁到 60 岁的男性、17 岁到 40 岁的女性，发竹枪也在计划之内。拦截到的日本密电（美军早已破译，代号 Magic——就是「破译日本外交电报」这套情报系统）显示：东京确实在试探和谈，但**只肯通过苏联居中调停，而且底线是保住天皇制、自己解除武装、不设占领军**——军部强硬派甚至在这些条件上还嫌软。

1945 年 7 月 26 日，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——就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，并警告「否则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」。公告通篇没有提一个字：天皇的地位怎么办。而天皇制恰恰是东京唯一真正在乎的条件。两天后，首相铃木贯太郎开记者会，用了「默杀」一词——日语里可以读作「不予置评、暂且搁置」，被美方译成「无视、拒绝」。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次致命的误译，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当时的语境下它就是拒绝的意思。无论哪一种，华盛顿收到的信号是：通牒被拒了。

决定是怎么「滑」出来的

再看美方这边。曼哈顿计划花了约 20 亿美元（相当于今天的两三百亿），造出了两枚可用的弹：铀弹「小男孩」和钚弹「胖子」。1945 年 5 月底，一个叫做临时委员会的顾问机构——由陆军部长史汀生牵头，科学家、官员、工业界代表组成——开会讨论怎么用。结论记录在案：**不经事先警告，直接投在「军事设施或军工厂周围、工人住宅密集」的目标上**，以求最大心理震撼。

目标委员会挑城市的标准，冷静得近乎技术选型：城市要大到三英里直径以上，要有可观的军事价值，**而且之前没被大规模烧过——这样才能精确测出这一枚弹的威力**。京都本来排在第一位，是史汀生凭个人记忆（他年轻时去过，视其为文化古都）反复坚持，才把京都从名单上划掉，换上了长崎方向的小仓——后来小仓因天气躲过一劫，长崎顶了上去。这是第九章的事。

杜鲁门本人 4 月接任总统时，根本不知道有原子弹这回事；他是在罗斯福去世后才被告知的。到 7 月 25 日，也就是波茨坦会议期间，一份由代理参谋长汉迪将军签署的使用命令发出：8 月 3 日以后，天气允许即可投弹。**从这一刻起，「扔」成了默认选项——要让它不发生，反而需要有人主动去踩刹车**。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「我做出了决定」；史汀生写给他的备忘录、以及整个官僚机器的运转方式，更接近另一个真相：决定在很多只手里被共同做出，也因此可以被每一只手推卸。

大白话：讨论原子弹「该不该扔」时，我们脑子里总有一个英雄或罪人的形象，站在按钮前。但 1945 年的真相更像一列已经开动的火车：烧钱的机器要交代，军方要测威力，谈判桌上要筹码，总统没有踩刹车的理由而踩刹车的理由要由他来扛。正义问题的难度，一半就在这列火车的惯性里。

这一章要钉死的三颗钉子

后面的哲学辩论会不断回到这三个事实，先钉死：

1. **原子弹登场时，大规模杀平民已经是这场战争的日常。**东京一夜 10 万，德累斯顿、汉堡也是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「能不能杀平民」——那道线在 1945 年之前就已经被推到了远处——而是「用这种方式、为这种目的杀，有没有不同」。
2. **日本当时还没有投降，但已经不是「无条件顽抗到底」的整体。**军部要战，外务省和部分重臣在找台阶，天皇本人态度暧昧但逐渐倾向结束战争。台面上的僵局，核心就是「无条件投降」四个字碰上了「天皇制」三个字。
3. **桌上从来不是只有「扔」和「不扔」。**演示、等待、封锁、修改投降条件、继续常规轰炸——第七章会一张一张翻这些牌。一个决定是否正义，取决于它和**当时真实存在的替代方案**比，而不是和幻想中的完美结局比。

带着这三颗钉子，下一章先去拿工具：「正义」这个词，哲学家们其实造了好几把不一样的尺。不先看清尺子的刻度，后面所有的「该」与「不该」都是空对空。

第二章·先拿出三把尺

为什么「正义吗」这个问题常常吵不下去

看任何一场关于原子弹的网络争论，十分钟后你都会发现一个模式：一方说「它结束了战争，救了上百万人的命」，另一方说「你杀了十几万平民，其中很多是孩子」——然后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。

这不是因为有一方蠢，而是因为他们**在用不同的尺**。第一方用的是「看结果」的尺，第二方用的是「看行为本身」的尺。两把尺量同一件事，得出相反结论，再正常不过。所以这一章的任务很朴素：把哲学史上量「正义」的三把主尺拿出来，看清每把尺的刻度、单位和盲区。后面每一章，就是拿这三把尺轮流去量 1945 年 8 月的那个决定。

第一把尺：算盘——后果主义

后果主义，就是看一个行为正义不正义，只看它带来的后果：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行为就是对的，反之就是错的。它最出名的版本叫功利主义——十八世纪末由边沁提出、十九世纪由密尔（又译穆勒）打磨的那套算法：行为的正确性，按它产生的「幸福总量减去痛苦总量」来计算。边沁的口号是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」。

这把尺有三个鲜明的性格：

- **它对谁都一视同仁**。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，在算盘上值一样的数。美国大兵的命和日本小学生的命，权重相同——这一点在战时听起来几乎刺耳，但它是这把尺的硬核所在。
- **它允许「两害相权」**。杀人是坏的，但如果杀 20 万人能避免死 100 万人，算盘派会说不杀才是错的。第五章会看到他们怎么算这笔账。
- **它的软肋是「算不准」和「算到哪儿为止」**。1945 年没人知道不扔会死多少人——所有数字都是估计，而且估计可以被想要结论的人悄悄调大。后果主义在数学上最干净，在事实上最依赖诚实。

第二把尺：底线——义务论

义务论，来自希腊语「义务」一词，意思是：有些行为本身就是对或错，跟后果无关。它最重要的版本来自康德（十八世纪末）。康德最有名的一条律令，用大白话说是：**永远把人当作目的，绝不只当作工具。**

「只当作」三个字是关键。雇人搬砖是把人当工具，但同时也尊重他是自愿挣钱的独立的人，所以没问题；而向一座城市扔炸弹，那里的平民——包括几万名儿童——被烧死不是「不幸的副作用」，就是设计目的的一部分（第五章会看到，临时委员会选目标时就是奔着「最大心理震撼」去的）。在康德看来，这是把十几万人纯粹当作「给日本政府施压的材料」。这种用法，救再多人的命也不能把它洗白——就像你不能杀一个健康的人去取器官救五个病人，哪怕算盘上 $5 > 1$ 。

这把尺的性格也三条：

- **它给每个人画了一条不可交易的底线**，防止「为了大局」把任何人吞掉。
- **它让「意图」变得重要**。瞄准医院开炮和炸桥时震塌了医院，后果可能一样，但底线派认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。第六章讲「双重效应原则」时会用到。
- **它的软肋是「绝对」**。如果遵守底线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——比如战争多打一年、多死一百万人——底线还守不守？康德倾向于守到底，这让很多人觉得这把尺在真实世界里太硬。第八章的「脏手问题」就是冲这个软肋来的。

第三把尺：专门量战争的尺——正义战争论

第三把尺是专门为了「战争中的决定」造的，历史也最久：从奥古斯丁（四世纪）、阿奎那（十三世纪），到近代的国际法先驱格劳秀斯，再到当代哲学家迈克尔·沃尔泽 1977 年的《正义与非正义战争》把它彻底现代化。它叫正义战争论，核心想法是：战争不自动等于道德真空，打仗这件事可以分两步问——

- 开战正义（拉丁文 *jus ad bellum*）：**这场仗该不该打？** 看开战理由正不正当（自卫算，抢地盘不算）、是不是最后手段、发起者是不是合法权威、有没有胜算。这是第三章的内容。
- 交战正义（拉丁文 *jus in bello*）：**仗的过程守不守规矩？** 两条核心规则：**区分**——打击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，不能把平民当目标；**比例**——军事收益要和附带伤害相称，不能为炸一个岗亭毁掉一条街。这是第四章的内容。

这把尺的妙处在于：它承认战争有时候不得不打（不像和平主义者），又不接受「战争无道德」（不像现实主义者）。它是一把折中的尺，也因此是今天国际法（日内瓦公约等）的哲学地基。

它的软肋是：刻度的松紧取决于时代。1945 年，「把城市区域烧掉」在盟军这边已经是常规操作，按当时的交战惯例，广岛并不出格；按今天日内瓦公约的标准，它就是战争罪。用哪一年的刻度来量，本身就是一场辩论——第四章会正面处理这个问题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三把尺各量一样东西。算盘量「结果好不好」，底线量「这事本身能不能做」，正义战争论量「按打仗这个行当自己的规矩，这一步过不过分」。一个决定可能过一把尺、栽在另一把上——这不是尺子坏了，这正是「正义」这个词里真实存在的张力。

预告：三把尺的分歧点在哪

先把结局剧透一半，好让你后面读得有方向：

- 在「这场太平洋战争该不该打」上，三把尺罕见地一致：日本是侵略方，美国应战，这一关基本没人替日本喊冤。争的是「无条件投降」这个目标正不正当。
- 在「原子弹」上，三把尺彻底散开：算盘派大概率说扔得对（但第七章会看到，这笔账经不起「替代方案」的检验）；底线派大概率说扔就是错；正义战争论内部吵成一团，因为它取决于你认哪一年的「区分」标准、以及「最高紧急状态」能不能豁免规则。

下一章开始动真格：先用正义战争论的上半截，量一量这场仗本身。

第三章·这场仗该不该打

先问一个几乎没人替日本喊冤的问题

正义战争论的第一半叫开战正义——这场仗该不该打。放到太平洋战争上，这一半出奇地没有悬念，但正因为没悬念，人们往往跳过它，漏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争议点：**不是「该不该打」，而是「打到什么程度才算够」**。先把没悬念的部分快速过一遍，把真正的争议挑出来。

开战理由：教科书级的「正当」

正义战争论认可的开战理由，头号是「抵抗侵略」。看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的轨迹：

- 1931 年占领中国东北（九一八事变）；
- 1937 年全面侵华，南京陷落后发生持续数周的大规模屠杀与暴行；
-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袭珍珠港——在谈判仍在进行、且宣战书没能及时送达的情况下动手，按当时的国际法，连「先宣战后打」的程序正义都没守住。

美国是挨打后应战的一方，开战理由是自卫——这是正义战争论里最干净的一种。合法权威（国会正式宣战）、最后手段（此前已用谈判、石油禁运等非战争手段施压多年，而日方选择的是把舰队开出来）这几条，也都能过。所以「美国该不该对日本作战」这个问题，三把尺的答案罕见地一致：该。

值得多说一句的是比例原则在开战层面的用法：不但「能不能打」要掂量，「打下去值不值」也要掂量。到 1945 年，日本的败局已定——海军主力沉在海底，本土被潜艇和飞机封锁到石油见底、粮食配给逼近饥饿线。这时候「继续打」的正当性，不再取决于「该不该抵抗侵略」，而取决于**你要打到什么目标才停**。这就把我们引到真正的争议上。

真正的争议：「无条件投降」是正义的战争目标吗

1943 年 1 月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突然宣布：盟国将要求德日**无条件投降**。这个词借自美国内战时期格兰特将军的绰号。罗斯福的算盘有两层：一是吸取一战教训——1918

年德国是「停战」而非投降，留下了「我们没输，是被背后捅刀」的毒苗，二十年后长成了希特勒；二是稳住斯大林，表明美英不会单独和德国媾和。

但这个目标在正义战争论里站得住吗？量一量，两边都有话说：

站得住的一面。一个发动侵略、在南京和马尼拉犯下大屠杀、虐待战俘致死的政权（日军战俘营的死亡率远高于德意战俘营），盟国有理由不满足于「换一批人接着执政」。战后对德日的占领改造——去军国主义化、战争罪审判、和平宪法——回头看确实比 1918 年的「停战了事」结实得多。日本到今天没有再发动过战争。支持者会说：要求一个这种记录的政权彻底缴械，不是贪婪，是负责任。

站不住的一面。正义战争论要求战争目标与战争行为之间保持比例：**目标每抬高一寸，就要用更多人的命去够它**。当时的美国外交官（如前驻日大使格鲁）和不少军方人士（包括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）都认为：坚持「无条件」、又死活不肯说明天皇的地位，等于亲手把日本唯一肯谈判的那批人（重臣与外务省）的台阶拆了——因为对东京来说，「天皇制存废不明」就等于「国体可能被消灭」，那只有打到底。批评者的说法是：**为了一个字面上的「无条件」，战争可能多打了几个月，而这几个月的每一天都在死人**——死的还包括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各地的平民，他们才是这段时间里最大的失血口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「无条件投降」之争，是一个目标成本问题。要求对方彻底认输，听起来天经地义；但如果对方明明愿意为「保住天皇」这一个条件签字，而你偏不肯把这四个字说清楚，那么多死的每个人，账都要算到「无条件」这三个字的洁癖上。战后美国实际接受的结果——日本投降，天皇保留——恰恰证明这个条件本来就可以谈。

这一章的结论，和留给下一章的难题

用开战正义这把尺量下来：美国打这场仗，正义；日本的战争目标，不正义；但「无条件投降」这个具体的战争目标，处在灰色地带——它既可能是对历史教训的正当汲取，也可能是把战争不必要地拖长的执念。而且请注意一个结构性的点：**这个灰色地带是原子弹辩论的暗线**。第七章会看到，「保留天皇的有条件投降」正是当时桌上最被低估的一张牌——如果这张牌被接受，按钮的问题可能根本不会出现。

但假设仗确实要打下去，问题就换了：仗该怎么打？城市可以烧吗？平民可以炸吗？正义战争论的下半截——交战正义——有两条专门管这个的规矩。下一章量它。

第四章 · 仗该怎么打

两条管打仗的规矩

正义战争论的下半截叫交战正义——就算仗是该打的，打法也有规矩。两条核心：

- **区分原则**：打击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。士兵扛了枪，承担被杀的风险；平民没有，所以不能把他们当目标。这条规矩的逻辑根基是：你正义的理由是「反击拿武器的人」，那没拿武器的人就不在你的理由覆盖范围之内。
- **比例原则**：哪怕目标合法，附带伤害也要和军事收益相称。为炸一个弹药库震碎旁边的玻璃，可以；为炸一个弹药库烧掉半个城区，不行。

拿这两条去量广岛，结论似乎显而易见：一座 35 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区被选作目标，约 8 万人当场死亡，绝大多数是平民——区分和比例全过不了。

但辩护者会立刻反问：**你用的是哪一年的尺？**这一章的主线，就是这条线是怎么在八年里被一步步磨掉的。看清这个过程，你才能判断「当时大家都这么干」到底算不算一个正义的论据。

一条线是怎么消失的

起点（二十世纪初）：线还在。1907 年海牙公约明文禁止轰炸「未设防的城镇」。飞机刚出现时，各国普遍承认从天上炸平民是越线的。

三十年代：线开始被踩。1937 年，德国秃鹰军团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；同年日军轰炸上海、南京；1940 年德军炸平鹿特丹市中心。每一次，国际舆论都谴责，但每一次踩线的人都没付代价——**谴责而没有后果，等于默许。**

1940-1942：英国转向「区域轰炸」。不列颠空战中德军夜袭伦敦（闪电战），英国发现自己夜间根本瞄不准工厂——1941 年一份内部报告（巴特报告）承认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炸弹落在目标五英里之内。既然瞄不准，干脆重新定义「准」：1942 年的「区域轰炸指令」把目标定为「德国工人的士气」，德哈林备忘录（物理学家林德曼给丘吉尔的建议）论证轰炸

工人住宅能「摧毁住房、瓦解士气」。于是**平民从「不能碰」变成了「正式目标」**——理由还是那把算盘：瓦解士气可以缩短战争。

1943-1945：大火常态化。1943 年 7 月汉堡，燃烧弹引发火焰风暴，约 4 万人死亡；1945 年 2 月德累斯顿，约 2.5 万人死亡；1945 年 3 月东京，一夜约 10 万。美军在欧洲口头上坚持「精确轰炸」（尽管实战中云里雾里的轰炸和区域轰炸差别有限），但到了太平洋，李梅接手第 21 轰炸机司令部后干脆转向：夜间、低空、满载燃烧弹、瞄准城市木造居民区。理由是技术性的——高空急流和天气让精确轰炸无效，而日本的军工又是大量分散在居民区里的小作坊。**请注意这个论证的形状：因为打不准军事目标，所以把「打不准」本身变成战略。**

到 1945 年 8 月，「烧掉一整座城市」已经不是需要辩解的破格行为，而是参谋计划里的常规栏目。广岛的特殊性只剩下一条：一架飞机干三百架的活，以及一种前所未见的死法。

「线已经没了」能替按钮辩护吗

现在可以正面回答辩护者的反问了。「当时大家都这么干」有两种用法，一种有效，一种无效：

- **有效的那一种：衡量罪责的轻重。**如果要审判「杜鲁门是不是一个战犯」，把他放进 1945 年的规范环境里比，他并不比指挥东京、汉堡、德累斯顿轰炸的任何人更坏。用 1977 年才写进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标准（明确禁止把城市里的分散军事目标当作一个整体目标来炸）去追溯定罪，既不公平，也没道理——当时这把尺不存在。
- **无效的那一种：论证行为本身正义。**「规范已经垮了」描述的是环境，不是道理。底线派会指出：1937 年全世界谴责格尔尼卡时，「不能蓄意炸平民」的道理就已经在那里了，后来只是大家都开始不讲这个道理。**一个道理的失效是因为没人守，不等于它失效是因为它是错的。**一百万个人踩过的线，还是一条线；只是守它的代价变高了。

换句话说：用 1945 年的刻度，广岛「不比别人坏」；用交战正义本身的刻度——那条不随年份变的——它过不了区分和比例。这两个答案都是真的，而它们的裂缝，就是这一章要留下的感觉。

大白话：道德滑坡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滑到底的人回头一看，会觉得「我一直都站在平地上」。东京烧过、汉堡烧过，到广岛时，「烧城市」对决策者而言已经像日常作业。但「习以为常」是心理事实，不是道德论据——它解释了为什么决定那么容易做出，却不能证明决定是对的。

比例原则的最后一问

就算接受「城市已被当作合法目标」的战时惯例，比例原则还剩最后一问：**这一次的军事收益，配得上这一次的平民死伤吗？**广岛有第二总军司令部、有码头和军工，这是事实；但被选中的瞄准点是市中心的相生桥——为了最大化冲击波覆盖和「心理震撼」。收益与伤害的相称性，最终取决于一个问题：这一炸到底换来了什么？是「结束战争」，还是「加速一个本来就在到来的结局」？

这个问题，光靠原则答不了，得算账。下一章请出算盘派：后果主义的账本上，「不扔会死多少人」这个数字，是怎么被算出来、又是怎么被越算越大的。

第五章 · 算盘派的账

算盘派登场：先看他们最强的牌

上一章结尾留下一个问题：这一炸到底换来了什么？这正是后果主义的主场——别谈原则，算账。算盘派为原子弹做的辩护，是人类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「两害相权」论证，它最强的那张牌值得一字一句复述：

日本不肯投降，而战争每多打一天都在死人——不只死美国人，还死中国人、东南亚人、朝鲜人、日本人自己。结束战争只有两条路：登陆本土打一场冲绳式的大屠杀，或者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武器把对方的意志炸碎。我们选了死得更少的那条。

如果账本真的长这样，算盘派赢得很轻松：广岛、长崎到 1945 年底合计约 20 万人死亡（广岛约 14 万、长崎约 7 万，含辐射与伤病的后续死亡），而另一边的账是「百万级」。**问题全在这「百万级」是怎么来的。**这是本章的主线：跟着一个数字，看它怎么从备忘录走到教科书。

「一百万」这个数字的旅行

杜鲁门在回忆录里写，马歇尔告诉他登陆日本本土「可能要付出五十万美国人的生命」，别处他又说过「一百万」。这个数字从此成了大众记忆里的标准答案。但历史学家（最有代表性的是巴顿·伯恩斯坦、加尔·阿尔佩罗维茨）去翻了 1945 年 8 月之前的军方档案，发现的是另一组数字：

- 登陆计划叫没落行动——分两步：1945 年 11 月先打九州（奥林匹克行动），1946 年春再攻关东平原（小王冠行动）。
- 军方在投弹前给决策者看的伤亡估计，主流区间是**总伤亡（含受伤）几万到几十万**：比如马歇尔参照吕宋岛战役的伤亡率推算九州战役头三十天约 3 万人伤亡；各军种的推演里，阵亡数（不是伤亡数）的典型估计是 2 万到 4.6 万这个量级。

- 「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国人的生命」这个说法，战前主要出自胡佛 1945 年 5 月给杜鲁门的一份政治备忘录——它不是军方推演，而是前总统的直觉估计；战后则由史汀生 1947 年在《哈泼斯》杂志的署名文章《使用原子弹的决定》正式「封圣」。那篇文章是原子弹辩护的奠基文献，也是「百万」数字的放大器。

换句话说：**「扔原子弹救了一百万美国人」是一个战后长出来的说法，不是决定当时的依据**。决定当时的账本上，数字小得多。这不等于账就反过来算了——20 万对 4 万，方向可能还是「不扔死得更多」——但它戳破了算盘派最常用的那句话里的虚胖。

把账本摊全：不能只算登陆那一栏

诚实的算盘派（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伯恩斯坦式的对冲者）会接着摊开更多的栏。这也是这套算法最有力量、也最值得尊敬的地方——它要求你把**所有人**放进账本：

- **亚洲战场栏**。1945 年的每一天，日本还占领着从缅甸到华北的大片土地。历史学家估计，战争机器在亚洲每天造成的死亡以千计、每月以十万计——中国战场、东南亚的强制劳工与饥荒、荷属东印度的粮荒。日本晚投降一个月，这个数字就再添上十几万，其中没有一个美国人。这是支持扔弹的账里**最硬的一栏**，也恰恰是美国舆论里最少被提到的一栏。
- **日本国内栏**。即便不登陆，封锁加燃烧轰炸继续打下去，1945 年冬到 1946 年春日本面临真实的饥荒风险（战后盟军粮食统计确认了库存已逼近警戒线），加上常规轰炸持续，日本平民的死亡未必比原子弹少——东京一夜 10 万的速度摆在那里。
- **战俘栏**。东南亚的盟军战俘与侨民在 1945 年夏天的处境是每个月都在死人，而且日军有「玉碎」前处决战俘的预案与先例。

摊全之后，后果主义的账大致是：扔弹当场死约 20 万；不扔，若战争多拖两到三个月，亚洲各地加日本国内的增量死亡，量级很可能超过 20 万。**这就是算盘派的最强形态——不是「救了一百万美国人」，而是「救了几十万亚洲人和日本人」。**

账本的两个暗门

但这套算法有两个暗门，良心账房必须指出来：

暗门一：反事实不可验证。「不扔会死更多人」依赖一个无法证伪的假设——日本不会很快投降。可 1946 年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官方结论写的是：「即使原子弹未投下，即使苏联

未参战，即使未计划登陆，日本也肯定会在 194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、极有可能在 11 月 1 日之前投降。」如果调查团是对的，那么「战争多拖几个月」这一栏整个不存在，算盘当场反转。后果主义者自称只看事实，可它的核心输入偏偏是**猜的**。

暗门二：账本被偷偷换了行。注意前面所有的账都在比较「扔弹」和「全面登陆」——可第七章会看到，1945 年 8 月桌上还有别的行：演示、等苏联、修改投降条件、封锁。拿「扔」去比最烂的那个选项，任何决定都能显得很划算。**后果主义的正确性，完全取决于你把哪些选项放进账本**——而放哪些，是记账人自己选的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算盘派的辩护，从「救了一百万美国人」（战后吹大的）修正成「救了几十万亚洲人」（更诚实的版本）之后，其实仍然很强。但它有两个无法愈合的伤：一是「不扔就不投降」只是猜测，连美国自己的战后调查都猜反了；二是它只和「全面登陆」比，故意不看桌上其它的牌。一本账的可信度，取决于记账人愿不愿意把所有行都摊开。

小结：算盘派的判决

在「最诚实的记账方式」下——计入亚洲战场、计入饥荒、修正登陆数字——后果主义给出的结论是：**扔弹很可能（但不确定）减少了总死亡**。这是一个「可能赢」的判决，不是「稳赢」；而且它赢的前提是「别的牌都打不过它」，这正是第七章要检验的。

但先别急着结账。因为另一派哲学家根本不认这本账——不是嫌你算错，而是说：**有些行为，算出花来也不能做**。下一章，底线派登场。

第六章·底线派的禁令

账本之外：有一种「不」不需要算

第五章的账本，底线派从头到尾不会看第二眼。不是他们清高，而是他们的出发点根本不同：**一个行为正义不正义，先问它「是什么」，再问它「换来什么」**。如果它本身就是那种不能做的事，账算得再漂亮也白搭——就像你不会问「严刑逼供到底省了多少破案经费」，因为对很多文明社会来说，刑讯这件事不参与这种计算。

这一章把底线派的两件武器拆开来：康德的「人不是工具」，和阿奎那传下来的「双重效应原则」。然后让它们直面广岛。

康德：那条「只当作」的红线

第二章说过康德的律令：永远把人当作目的，绝不**只**当作工具。「只」字决定一切。要判断广岛是否越线，得先问：那十几万死者，在这个决定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

看决策文件。临时委员会 1945 年 5 月 31 日的结论：不经警告，投在「军事设施或军工厂、周围是工人住宅」的目标上，以求**最大心理效果**。目标委员会挑城市时明确要求「之前未被大规模轰炸」，好让破坏效果可以被干净地测量和展示。把这两份文件放在一起，死者在计划里的角色就清楚了：**他们的死亡本身就是要传递给东京的信号——尸体是电报的内容，不是电报的噪音**。

这正是康德说的「只当作工具」的最纯粹形态。那些死者里，有清晨在教室里被整班烧死的学生——广岛当年把上万中小学生动员到市中心拆房辟防火道，8 月 6 日早上 8 点 15 分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街上列队。在康德看来，「杀了他们可以让战争早结束三个月」这句话，和「杀一个人取器官可以救五个人」是同一种句子：**算盘算得通，恰恰说明算盘量错了东西**。人不是可以互相冲抵的数字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带底线的「目的王国」成员——这就是「人是目的」这句名言在操作上的含义。

双重效应：意图和预见的分水岭

立刻有人反驳：照这么说，任何会误伤平民的轰炸都不能做了？战争还怎么打？底线派早就准备好了答案，叫双重效应原则——源自阿奎那对自卫的讨论，后世天主教伦理学把它打磨成四条检验。一个「造成坏结果的正当行为」要同时满足：

1. **行为本身**是好的或中性的（炸军火库可以，杀平民不可以）；
2. **意图**只指向好结果（想炸的是军火库，不是旁边的居民区）；
3. **坏结果不能是好结果的手段**（不是「靠炸死工人来停产」，而是停产靠炸毁设备，工人之死是可悲的旁路）；
4. **相称性**——好结果要配得上坏结果（这条和第四章的比例原则相通）。

第三条是灵魂，它区分的是意图与预见：炸桥时你**预见**会震塌旁边的民房，和**故意**炸民房来吓唬守军，尸体可能一样多，但在道德上是两种行为。为什么？因为前者的计划里，如果民房奇迹般空无一人，任务照样成功；后者的计划里，「有人死」恰恰是成功的条件——人死了才吓得住人。

现在把这四条对准 1945 年 8 月 6 日：目标是市中心（第一条勉强靠第二总军司令部找补，但瞄准点是相生桥，为的是冲击波覆盖全城）；意图文件写明求「心理震撼」——也就是要靠平民之死施压（第二条不过）；平民的死亡是制造震撼的手段（第三条，斩钉截铁地不过）。**双重效应原则判广岛：故意以平民之死为手段，等同于蓄意杀伤无辜。**1956 年，哲学家安斯康姆正是因为这个逻辑，在牛津投票反对授予杜鲁门荣誉学位——她的理由冷得像刀：「他选择了以杀害无辜为手段来结束战争。」

底线派的软肋，和它的回答

诚实起见，得把这一派最难堪的问题摆出来：**如果守住底线意味着战争多打三个月、多死几十万人，你还要守吗？**你的「不扔」，也是一种选择，也有尸体——只是尸体不在你眼前。

底线派的回答分两层。第一层是概念上的：**「做」和「任由发生」在道德上不等价**。医生不杀一个病人去救五个，不等于医生「害死」了那五个——他拒绝让自己成为杀戮行为的作者，而疾病的账算在疾病头上。同理，继续战争造成的死亡，首先要算在发动战争、拒绝投降的日本政府头上，而不是算在「拒绝杀平民」的一方头上。康德会说：道德对我要求的，是我不作恶，不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世界上所有的恶。

第二层是策略上的：「守底线就得多死几十万人」这个前提本身，是第五章那个吹大的账本喂出来的。如果第七章的替代方案成立——如果改一个字（明确保留天皇）、或等三个星期（苏联参战）就能结束战争——那么「底线与性命二选一」就是个被构造出来的假两难。**底线派最深的怀疑是：人往往先用尽一切办法不去找第三条路，然后宣布自己别无选择。**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算盘派问「怎么做死的人最少」，底线派问「我能不能成为做这种事的人」。前者怕后果，后者怕越界。底线派不是不知道「不扔也有代价」，他们是不接受「所以就可以杀无辜」这一步推理——就像你不接受「所以就可以刑讯逼供」。两派的分歧不在算术，在于：人这条命，到底是账本上的数字，还是账本的边界。

这一章的判决

用康德和双重效应量下来：广岛越线，而且是教科书级的越线——平民之死是手段而非副作用。但底线派赢得这个判决的方式，也暴露了他们必须回答的追问：当「不作恶」的代价是「任由更大的恶发生」时，干净的手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？

这个问题有个专门的名字，叫「脏手问题」，它在第八章会成为为杜鲁门辩护的最后堡垒。但在去那里之前，得先检验一个更基础的事实问题：桌上到底有没有第三条路？下一章，翻牌。

第七章 · 「别无选择」是真的吗

「别无选择」——这句话是史实，还是事后的安慰

前面几章反复撞见同一个前提：扔弹之所以「必要」，是因为**没有别的办法结束战争**。杜鲁门后来一遍遍地说「我别无选择」；这句话顺耳到很少有人停下来翻一翻当时桌上的牌。这一章就翻牌。结论先放这：**1945 年夏天，桌上至少有五张牌，每一张都有人正式递上去过，每一张都被推开了**。「别无选择」不是发现，是选择之后追加的叙事。

第一张牌：先炸给他们看

1945 年 6 月，芝加哥大学的一群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提交了弗兰克报告——以物理学家詹姆斯·弗兰克领衔，签字者包括后来四处奔走的西拉德。报告的核心建议：**先在一次无人地带的公开演示中展示原子弹**，邀请日本和国际观察员见证，再要求投降；不从，再考虑军用。7 月，西拉德又组织了一份 70 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，直送总统（层层转交，杜鲁门是否亲眼看到成谜）。

演示方案为什么被否？临时委员会的科学顾问小组（奥本海默、费米、劳伦斯、康普顿）列了理由：弹可能是哑弹，当众丢脸反而帮了日本；演示的威力不如实战震撼；也无法把战俘撤出演示区。这些理由并非全无道理——但它否决的其实是「纯演示」，而不是「演示加警告加最后通牒」的组合拳。从「单一方案有缺陷」滑到「警告这条路整体作废」，这一步是**逻辑跳远**。

第二张牌：等苏联

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，斯大林承诺德国投降后两到三个月内对日作战——也就是 8 月上中旬。华盛顿从 Magic 破译电里看得清清楚楚：东京到 7 月底还把全部希望押在「请苏联调停」上。也就是说，**只要苏联宣战，日本最后一个幻想就碎了**——这件事美方事前完全知道，而苏联参战日是白纸黑字定好了的：8 月 8 日（远东时间 8 月 9 日凌晨红军攻入满洲）。

后来日本决策层的证词（近卫、木户、铃木等）以及历史学家长谷川毅在《与敌人赛跑》中的档案研究都指向同一个判断：**压垮东京的不是广岛，而是苏联参战**——广岛的消息传来时军部还在开会装镇定，苏军坦克开进满洲的那个凌晨，「苏联调停」这条最后的绳索断了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才真正崩盘。这个「苏联决定论」在史学界有争议（弗兰克等学者强调原子弹的独立作用），但它至少证明：等两个星期看苏联参战的效果，是一个**当时就知道时间表、成本几乎为零**的选项。它被推开，部分原因恰恰是国务卿贝尔纳斯想**赶在苏联前面**结束战争，好让斯大林在远东分不到战利品——这就是阿尔佩罗维茨 1965 年《原子外交》提出的著名（也有争议）的修正派论点：原子弹炸的不只是日本，也是给莫斯科看的。

第三张牌：改一个字

第三章说过，僵局的核心是「无条件投降」撞上天皇制。1945 年 5 月 28 日，前驻日大使格鲁正式建议：在劝降文告中明确「可以保留天皇制下的君主立宪」。史汀生和助理国务卿麦克洛伊都赞成。反对者是贝尔纳斯，他担心国内舆论（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要求严惩天皇）和「对日软弱」的指控。于是波茨坦公告对此**只字未提**。

而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近乎残酷的证据：8 月 10 日，日本在挨了两颗原子弹、苏联参战之后提出投降，条件正是一——保留天皇。美国接受了，用「贝尔纳斯答复」措辞：天皇的权威「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」。**绕了一圈，终点就是 5 月底桌上那个条件**。如果 7 月 26 日的公告里就写上这四个字，有没有可能省下 8 月？没人能证明一定有——军部强硬派 8 月 14 日还想发动政变阻止投降——但也没人能否认：这张牌连试都没试过。而它的成本，只是四个字。

第四、五张牌：封锁，和接着烧

海军的主张（金恩上将等）历来是封锁加常规轰炸：日本石油见底、粮食配给逼近饥饿线，潜艇和水雷（「饥饿作战」）已经把海上运输掐死。第一章引过的战略轰炸调查团 1946 年结论就是这条路线的背书：不扔弹、苏联不参战、不登陆，日本也极有可能在 1945 年内投降。封锁的代价是时间——时间里亚洲战场每天还在死人（第五章那一栏是真的）——所以这张牌不是免费的，它的账是「多拖几周换不炸广岛」。

至于「继续常规燃烧轰炸」：东京一夜 10 万的先例说明，这条路在杀伤上不输原子弹，但在道德上与原子弹同罪——它只是提醒我们，「不扔原子弹」从来不等于「和平鸽」。

怎么评价这五张牌

诚实地说：没有哪张牌是「稳赢」的。演示可能失败，等苏联有地缘政治代价，改条件可能被军部解读为软弱，封锁要继续死人。但「每张牌都有风险」和「没有别的牌」是两回事。1945 年的真实状况是：一个由惯性、时间表（波茨坦会议期间要出结果）、国内政治（项目要交代、对苏要抢先）和道德疲劳共同驱动的系统，把「直接扔」当成了默认路径，然后事后把它追认为唯一路径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辩护者说「两害相权取其轻」，批评者翻开桌面发现那是一场五选一的考试，考生却只对了一个选项涂了答题卡。判断「该不该扔」之前，先得承认：不只有「扔」和「登陆」两个格子。

牌翻完了。现在为扔弹辩护的人退到了最后一道防线：就算有别的牌，就算越了底线——**一个对本国几百万士兵负责、对结束一场地狱战争负责的领导人，有义务弄脏自己的手。**这是第八章，为按下辩护的最强版本。

第八章 · 为按下辩护

给辩护方最好的律师

前面几章对「扔弹」越来越不客气：算盘有虚胖，底线被踩穿，桌上还有五张没打的牌。这一章反过来——给辩护方配最好的律师，让他们把案子在最强形态下打一遍。因为如果你不能复述对方最强的论证，你的反对就一文不值。辩护方真正的底牌有四张，一张比一张深。

第一张：它确实结束了战争

最朴素的论证，也最有力：8 月 6 日广岛，8 月 9 日长崎加苏联参战，8 月 15 日天皇广播投降。**地狱在第九天停了。**不管第七章的牌理论上多好，真实世界里叫停这场每天死上万人的战争的，就是这个组合。辩护方会说：哲学可以争论哪张牌「本可以」有效，但总统赌不起「本可以」——他手里有一张当场见效的牌，而他的人民正在冲绳的坟场、马尼拉的废墟和缅甸的丛林里以每天几千人的速度死去。1981 年，亲历太平洋战争的学者保罗·福塞尔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《感谢上帝有了原子弹》：那些原定参加本土登陆的士兵——包括他自己——得知战争结束时，「我们如释重负地哭了，我们快要活下来了」。**对那些名字已经写进阵亡名单草稿里的人来说，这颗弹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。**

第二张：最高紧急状态

哲学家沃尔泽在《正义与非正义战争》里给「破例」留了一个极窄的门：最高紧急状态——当威胁是「迫在眉睫的、且性质极端」（他给的唯一合格的例子是 1940-41 年独自面对纳粹的英国：输掉意味着一种「对人类价值的灭绝性威胁」），平时不可逾越的交战规则可以被暂时悬置。

辩护方可以借这扇门：1945 年的太平洋战争是一场对侵略者的圣战，结束它本身具有压倒性的道德价值；如果原子弹是唯一速胜手段，它就符合「紧急」。**但请注意，这扇门窄到沃尔泽自己都不让广岛过：**他明确写道，到 1945 年 8 月，日本战败已成定局，「紧急」已经不存在——当时要的不是避免战败，而是避免「多拖几个月的不便与代价」，这不够格。而且最高紧急状态的定义要求「别无他法」，第七章的五张牌正是冲着这一条来的。这张牌能

打出，但打完立刻被它的发明人没收——这本身就说明辩护方借用哲学资源时，常常只借一半。

第三张：脏手——领导人的义务包括弄脏自己

这是最深刻的一张牌。脏手问题（萨特戏剧里的说法，沃尔泽 1973 年写了同名经典论文）：政治家与普通人不同，他受托替几百万人做决定，于是可能陷入一种真实的困境——**为了共同体，他必须做一件道德上错误的事，而且做完之后，他仍然是错的**。关键点在「仍然」：脏手理论不是「为了大局做什么都对」——那是算盘派——它坚持行为的错误性不被后果洗白，错的账永远记在做的人头上。它的辩护形状是：「杜鲁门做了错事，但一个不肯为人民弄脏手的总统，是失职的总统。」

这个论证真正动人的地方，在于它承认代价：它不要求我们相信广岛是干净的，它要求我们承认——**领导有时意味着替众人承担罪**。用康德的尺子量，这不是辩护，是忏悔的格式；但它回答了一个底线派绕不开的问题：你选出来的人，到底欠你什么？欠你「他自己双手干净」，还是欠你「你和你的家人活着回家」？

杜鲁门本人的态度倒是没有这么哲学。1945 年 8 月 11 日他写信回应一位抗议投弹的教会人士：「当你不得和野兽打交道时，你就得用野兽的方式对待他。」他终身声称「从没为那个决定失眠过」。辩护方里比较有品味的成员，对这句「从没失眠」往往比批评者还不安——因为脏手理论的精髓恰恰要求那个决定让你失眠。

第四张：特殊责任——对「自己人」的偏爱，是不是一种义务

普世伦理（包括第二章的功利主义）要求所有生命等权重。但政治角色理论会说：总统不是世界总统，他是美国士兵和美国纳税人选出来的受托人，**他对「自己人」负有优先义务**——就像父母对孩子的偏爱不是道德缺陷，是角色义务。如果这个义务成立，那么在「不确定但可能多死几万美军」与「确定杀死十几万敌方平民」之间，受托人应当向自己人倾斜。

这张牌的限度也很清楚：它最多为「倾斜」辩护，不能为「无限倾斜」辩护——一个美国兵的命换一万个日本平民的命，任何版本的角色伦理都撑不住这个汇率。而且它倾斜的合理性，仍然依赖第五章那本账：到底有多少「自己人」的命真的押在桌上。

辩护方的最终形态，和它的裂缝

把四张牌叠起来，最强辩护是这样的：在一个由侵略发动、每天屠杀上万人的战争里，一个对本国士兵负特殊责任的领导人，面对唯一确定能立即停火的手段，选择弄脏自己的手，用一次越界换地狱提前关门——他做的或许是错事，但不做是更大的失职。

这段话值得被严肃对待。它的裂缝只有两条，但都致命级别：第一，「唯一确定能立即停火」依赖第七章检验过的假设，而那张桌上有五张牌；第二，就算这套逻辑能为「一枚」辩护——它能为第二枚辩护吗？广岛之后三天，东京还在开那台慢吞吞的会议，长崎就被炸了。辩护方的所有牌——「结束战争」「紧急」「特殊责任」——都建立在「需要足够大的震撼」上，而三天，够不够让震撼传到？下一章，把两枚弹拆开审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辩护方最强的样子不是「炸得好」，而是「炸得错，但有人必须去错」。这个版本可怕之处在于它几乎无懈可击——除非「必须」两个字不成立，除非「一次就够」是真的。第八章守住的是广岛的道德争议空间，第九章要看长崎还剩多少。

第九章 · 第二枚更难

为什么要分开审

谈论「原子弹该不该扔」时，人们习惯把广岛和长崎捆成一个事件。这在道德分析上是个错误。第八章已经看到：辩护方最强的牌——「用一次前所未有的震撼结束战争」——全部建立在「震撼」二字上。而震撼要生效，需要时间：消息要核实，官僚要开会，军部要服软，天皇要下决心。**如果第二枚弹在「第一枚的震撼还没来得及走完流程」的时候就落下去了，那它的辩护逻辑就完全变了**——它不再服务于「震惊东京」，而只能服务于别的目的。这一章先把那三天的时间线摆出来，再看每一把尺怎么判。

那三天，每一小时发生了什么

- **8 月 6 日 8:15**，广岛。东京当天就知道「广岛被一种新武器摧毁」，但军部的第一反应是控制消息、淡化定性——对外广播只说「新型炸弹造成相当损害」。陆军派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飞去现场确认；他 8 月 8 日才回报：是原子弹。军部部分人的自我安慰是：美国人大概只有一枚。
- **8 月 7 日**，杜鲁门公开声明使用了原子弹，并警告「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，他们可预期来自空中的一连串毁灭，这种毁灭在这个地球上前所未见」。最高战争指导会议**没有**因为这颗弹立刻召开紧急会议——请注意，这不证明震撼无效，只证明日本的决策机器慢得可怕：它的「圣断」流程，从一枚原子弹到下一次开会，就要两三天。
- **8 月 9 日凌晨 0 时过后不久**，苏军攻入满洲——第七章那张牌落地了。几小时后，**上午 11:02**，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。顺序很重要：**苏联参战在前，长崎在后**。

再看长崎这一次任务的细节，每一个都加重审问的分量：

- **日程是自己往前赶的**。第二枚原定 8 月 11 日投，天气预报说之后连着几天坏天气，于是提前到 8 月 9 日。也就是说，「三天间隔」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政策，**是气象预报定的**。
- **没有人为第二枚做过一次新的「决定」**。7 月 25 日的使用命令写的是：备好之后，按天气情况投向目标名单上的城市。广岛之后，机器按既定程序装弹、起飞。杜鲁门 8 月 10 日才下令停止核打击（理由是「不能再杀了，太可怕了」——据在场者转述）——也就是说，**长崎**

是在「默认继续」中发生的，不是任何人重新权衡后的选择。第一章那列火车的惯性，在这里达到顶峰。

- **长崎是替补的替补。**首选目标是小仓，当天小仓上空云量太大、还混着前一天八幡被燃烧弹轰炸的烟。博克斯卡号绕了三圈无法目视瞄准，油料告急，转飞备选长崎；到长崎又是云，最后靠雷达加云缝投弹，偏了瞄准点三公里，炸在浦上天主堂附近的山谷——东亚最大的天主教社区，恰好成了第二枚原子弹的归零地。

三把尺，各自判长崎

算盘派：第一枚的账（再难看也至少有「停火」一栏收益）到第二枚这里几乎塌了。广岛之后的边际收益是什么？辩护方最好的说法是：第二枚证明「不止一枚」，戳破军部「他们只有一颗」的幻想。但东京 8 月 9 日上午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时，议题早已被苏联参战主导；而且美国当时**真的只有两枚**——第三枚要 8 月下旬才能用，所谓「一串毁灭」短时间内是虚张声势。用约 4 万当场死亡（年底累计约 7 万）去换一次「可能加速了已经在崩盘的会议」，比例原则读不出数字。

底线派：和广岛同罪，且少了一半借口。广岛至少还能说「无前例可循、系统需要一次极端冲击」；长崎连「无前例」都没有——**它是在已经知道这种武器能做什么、且对方还来不及完整反应的情况下，按计划表执行的第二枪。**「人是目的」的红线被踩第二次时，连「情有可原」都变稀薄了。

正义战争论：「最后手段」和「必要性」两条同时不成立。苏联已经参战（战争天平在几小时内彻底翻转），无条件投降之外的条件谈判本来就缺一次尝试（第七章第三张牌），而第一枚弹的政治效应还没跑完流程。长崎在「必要性」上是三枚里最弱的——哦不，没有第三枚。这正是问题：**停下来的那一道命令，是在死了第二座城市之后才签的。**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如果广岛还能争论「必要之恶」，长崎更像「惯性之恶」。没有人坐下来决定炸长崎——日程表决定的，云决定的，7 月 25 日那份命令的默认状态决定的。道德上最可怕的不是恶人做决定，是好的理由在第一枚弹里就用完了，第二枚弹还在按流程飞。

这一章的判决，和它对全书的修正

分开审之后，「那两颗原子弹」不再是同一个问题，而是两个难度悬殊的问题：

- **广岛**：三把尺里有严重的分歧。底线派判错；算盘派判「可能对」；正义战争论内部取决于你怎么读 1945 年的必要性与区分标准。这是一个真正困难的案例——第十章的「重新决定」主要在它身上挣扎。
- **长崎**：三把尺几乎一致判错。它缺必要性、缺决策、缺等待，连辩护方最强的「震撼」牌都用不上。少数替长崎辩护的史家（如弗兰克）也只能说「军部确实还没投降，而每一天都在死人」——但这是辩护战争的延续，不是辩护这「第二枚」。

现在，所有材料都齐了：现场、三把尺、双方的最强论证、五张没打的牌、以及两枚弹的分开判决。是时候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了：如果重新做一次决定——我，该不该按下按钮？下一章不躲。

第十章 · 如果重新做一次决定

先把问题拆成两个

「如果重新做一次决定，我应该按下投放的按钮吗？」——这个问题其实藏着两个不同的问法，答案可以不一样：

- **问法 A（难的）**：把你放进 1945 年 8 月初的那个位置，**只给你当时决策者掌握的信息**——破译的日本密电、冲绳的伤亡、雅尔塔的日程表、临时委员会的报告——你怎么做？
- **问法 B（易的）**：带着今天的全部后见之明回到那个位置，你怎么做？

很多讨论偷偷用 B 的信息答 A 的问题，这不诚实。这一章两个都答，A 先答——因为它才是「重新做决定」的意思。我的答案不绕弯：**问法 A 下，我不按——至少不按原计划按；问法 B 下，我不按，而且确信得多。**下面是推理，不是姿态。

问法 A：1945 年 8 月初，只有当时的信息

先盘点那一刻「我」知道什么：日本败局已定但拒不接受无条件投降；密电显示东京通过苏联求和、唯一死结是天皇地位；苏联参战定在 8 月 8 日左右；军方估计本土登陆总伤亡几万到几十万（「百万」还没被发明）；桌上有一份被划掉的草案——在劝降文告里写明可以保留天皇；手上有两枚弹，科学家建议过先演示，被否决了。

在这个信息集里，我的动作序列是：

1. **先把那四个字写回去。**格鲁 5 月底建议、史汀生和麦克洛伊赞成的「可保留天皇制」条款，在波茨坦公告里补上。成本是四个字和国内政治风险；收益是有可能直接拆弹——不是拆原子弹，是拆掉整个僵局。这是第七章第三张牌，在当时的信息下它就是**期望收益最高、成本最低**的一手。哪怕概率只有三成，也该先打。
2. **把投弹时间挪到苏联参战之后。**日程表上那个日子是确定的：8 月 8 日。等到那一天，看「苏联调停」幻想破灭后东京的反应——再决定。这是第七章第二张牌，等待的成本要诚实承认：亚洲战场每天还在死人，多等一周就是几万条命。**我不假装这个成本不存在。**但「扔

下去确定死十几万平民」和「等一周可能多死几万人、也可能整个问题解决」之间，后果主义的账支持等，底线派的禁令更支持等。

3. **如果还要用，先警告加演示。**8月8日之后若仍无动静，发明确警告，并在无人区做一次公开演示，邀请观察员。它可能失败（哑弹、被解读为虚弱），但失败的代价是几天，不是一座城。
4. **以上全部失败之后，按吗？**这是逼到墙角的一问。我的答案是：**不按在城市的中心。**如果到了8月下旬一切牌都打光，而登陆的绞肉机真的开始转动，我不能替那时候的自己排除「对纯军事目标使用」的可能——但相生桥不是纯军事目标，浦上更不是。用平民区当信号弹这件事，第六章已经判了：那不是副作用，是手段本身。我宁可承担「没有更快结束战争」的责任，也不承担「以平民之死为手段」的行为本身。这是我把底线派的尺子放在算盘前面的唯一一处——理由在第八章：脏手理论说领导人要为共同体弄脏手，但它要求那件脏事「别无替代」，而1945年8月替代方案有五个。

我知道这个答案的代价。有人会像我评价杜鲁门一样评价我：优柔寡断、拿美国大兵的命换自己的道德洁癖、事后诸葛亮。第一个指控可以用信息反驳（我用的是当时已知的信息，不是后见之明）；第二个指控我部分认罪——我确实把「日本平民不死于我手」的权重，放得比「战争可能提前两周结束」高。这不是中立计算，这是我的价值排序，说出来让你检查。第三个指控，问法B来回应。

问法B：带着今天知道的一切回去

今天的信息多出来的关键三条：一，日本实际接受的终战条件就是「保留天皇」——那张牌是真的；二，美国自己的战略轰炸调查团结论：不扔弹、苏联不参战、不登陆，日本也极可能在1945年内投降；三，苏联参战对日本决策层的冲击至少不亚于原子弹（长谷川毅的档案研究），而长崎那次甚至没有独立决策。带着这三条回去，**不按，几乎是所有尺子的共同结论**：算盘派算不出「必须」，底线派本来就说不能，正义战争论的「最后手段」不成立。问法B下还坚持按的人，要负担很重的举证责任。

为什么我的答案和杜鲁门不一样

最后必须诚实回答一个反诘：你坐在空调房里说「不按」，杜鲁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「扔」，你们的差别真的是道德高低吗？

不全是。第一章说过，那个决定是一列火车的惯性：二十亿美元要交代、军方要测威力、贝爾纳斯要抢在苏联前面、国内要求复仇、而「叫停」的全部政治成本都压在总统一人身上。我今天的答案之所以更容易，恰恰因为我不在那列火车上。但请注意，这不是说「所以当时情有可原，讨论到此为止」——恰恰相反，它指向这本书真正的教训：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「我该不该按按钮」问到最后，答案分两层。对个人：不按——先打那五张牌，把炸弹留到所有牌打光之后，而且不扔在城市上。对系统：真正该做的决定发生在更早——别让问题以「按或不按」的形状来到任何一个人面前。好的决策设计，是让按钮旁边永远摆着别的牌，并且有人负责把它们递上来。1945 年的失败，一半在 8 月 6 日，另一半在于此前六个月里，格鲁的建议、弗兰克报告、西拉德请愿书，全都没能真正到达那只握笔的手。

所以，全书问题的最终答案：**不，我不按。**广岛在当时的信息下就是一个有替代方案的越界行为，长崎连替代方案都不需要——它只需要有人踩一脚刹车。而我这么说的底气不是「我比杜鲁门善良」，而是这本书前面九章替你（也替我）把账算完了：三把尺里两把半指向同一个方向，剩下半把（算盘）在信息修正之后也不再指向「按」。

只剩最后一个问题了：这个八十年前的决定，除了让我们练习思考，还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它关系大得很——因为它没有结束，它只是开始了。最后一章。

第十一章·按钮之后的世界

八十年没有再响过

先看一个容易被滑过去的事实：自 1945 年 8 月 9 日至今，核武器在战争中**一次也没有再被使用过**。其间有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、古巴导弹危机、数次印巴对峙——有至少十几次「用了也许能赢」的场合，按钮一次都没被按下。政治学者坦嫩瓦尔德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：核禁忌——不是条约禁令（那层纸经常被撕），而是一道长在决策者脑子里的道德底线：用了，你就越过了一条回不了头的线。

这道禁忌从哪来？很大一块，恰恰来自广岛和长崎本身。那两座城市的死法——闪光、黑雨、此后几十年的放射病与幸存者（被爆者）的证词——成了人类关于「这个东西是什么」的集体记忆。**那两颗弹最长久的历史后果，不是结束了那场战争，而是让此后的每一代人都得在它们的阴影下回答同一个问题**。这构成一个奇怪的道德结构：如果第十章的判决成立（那两次使用是错的），那么正是这两次错误，给世界买来了一道价值无法估量的禁忌。错误可以产生善果——但请立刻补上底线派的提醒：善果不能追认错误的正义性，它只说明历史不是道德账房。

威慑：一个用「不该做的事」支撑的和平

核时代给正义理论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。核威慑的逻辑是：我不打算用，但我必须让你相信我会用，这样你也不敢用——于是双方都不用。冷战靠这套逻辑避免了大国热战。

但拿第六章那把尺一量，它有个裂缝：**蓄意威胁做一件不义的事（把城市当目标），这本身正义吗？**如果扔是错的，那「可信地威胁要扔」就是在用错误当筹码。沃尔泽的出路是把威慑当作「次坏但暂无更好」的安排：它脏，但在核武无法被「去发明」的世界里，它可能是唯一能防止使用的承诺结构。安斯康姆式的底线派不接受这个出路：威胁杀无辜就是意图杀无辜的预备形态。这场辩论到今天没有判决——1968 年签署、1970 年生效的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用「你不再造、我逐步裁」的交易把问题冻结了起来；2017 年通过、2021 年生效的《禁止核武器条约》则是底线派的制度化尝试：不管威慑多好使，这东西本身非法。拥核国家无一签署。1996 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走在中间：核武器的使用「一般违反国际

人道法」，但「在生死存亡的极端自卫情形下」法院无法下定论——这份和稀泥的判决书，恰好是「威慑困境无解」的官方证明。

记忆之争：道歉问题

围绕那两颗弹，还有一场至今没打完的仗：记忆。每隔几年就有「美国该不该道歉」的争论。这本书的分析能给出一个比两边口号更清楚的框架：

- **从第九章看**，长崎那次连「当时的必要性」都难以成立，它是三把尺接近一致判错的行为——「道歉」的呼声主要立在这一枚上。
- **从第八章看**，脏手理论提供了一种不道歉也不自满的诚实姿态：承认那是错事，同时承认当时有人认为自己必须错。奥巴马 2016 年访问广岛时用的就是这个姿势：到场、致哀、献上花环，但通篇没有「对不起」，也没有「做得对」——只讲「道德觉醒」的必要。这大概是当代政治家在两种叙事夹缝里能走出的最诚实的步态。
- **从第一章看**，任何只从 8 月 6 日开始讲的记忆都是不完整的——前面有珍珠港、南京、马尼拉、巴丹。正义战争论的第一把尺提醒我们：这场战争有一个发动者。但第二把尺同样提醒我们：发动者的罪，从来不会变成平民孩子的罪。**两句话必须同时成立，这正是整本书的练习。**

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过去式

现在可以回答终章的标题了：为什么一个八十年前的决定，今天还要认真想？因为「按钮」是一个会换皮肤的结构，而 1945 年把它的所有零件都演示了一遍：

- **惯性零件**：决定以「默认继续」的方式做出，踩刹车比踩油门贵。今天它叫「流程」「预案」「时间表」。
- **换行零件**：只和最烂的选项比（「不用就只能全面登陆」），把中间选项悄悄撤下桌。今天它叫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」。
- **数字旅行零件**：一个战后才被发明的「百万伤亡」，倒填进战前的决策理由里。今天它叫「据估计」。
- **道德疲劳零件**：线不是被某次壮举跨过去的，是被一千次「这次情况特殊」磨没的。东京烧过之后，广岛只剩「一架还是三百架」的区别。

每当有新的按钮被造出来——不管是新的武器、新的监控系统，还是新的「不得不用」的技术——这四个零件都会原样出现。识别它们，就是这本书想留给读者的抗体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八十年前那只按钮早就拆掉了，但造按钮的流水线还在运转。这本书答完「按还是不按」（不按——理由在第十章），真正想说的是后半句：别让自己落到只剩按钮的局面。正义最难的部分从来不是最后一刻的勇气，而是那之前六个月里，有没有人坚持把别的牌摆上桌。

结束的地方，就是开始的地方

回到种子问题：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，是正义的还是错误的？这本书的答案是分层的——广岛：当时信息下是可争论的越界，今天信息下是错误；长崎：两个信息下都是错误，是惯性而非必要。而「我该按下吗」：不按——先打桌上的牌，把不可挽回的事留到所有牌打光之后，而那时你多半会发现，牌根本没打完。

但请别把这本书当成标准答案来背。三把尺还在你手里：算盘、底线、战争的规矩。下一颗按钮出现在新闻里的时候——它一定会出现——希望你记得的不是「J 说不按」，而是你自己跟着这三把尺，把那个决定重新量过一遍。那才是这本书想按下的东西。

按下，还是不按 · J